中国:一则动人的爱的故事

据说，二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经说过:“中国像是一只沉睡的狗(译者按:一说为“狮子”),不要去惊醒它;因为它一旦醒来,全世界都会发抖的。”

这些日子正是如此。中国正从数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?我们因为看到的东西而发抖。我们异口同声地谴责中国:那“豆腐渣”工程;那西藏骚乱;那不得不回收的众多玩具……

这段时间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,这一切不难理解。但是我却不然。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踏上这块土地以来,我一直是中国和中国人的钦佩者。当时毛泽东还统治着中国。我特别钦佩中国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。大约15年前,我在中国西部沙漠深处遇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子。正是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这块土地——现在人们还把它叫做“中部王国”——一切美好的事物。

当时我在香港居住。一次,我和我的朋友乔治决定乘火车去西伯利亚。我们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充满乐趣。火车会经过世界上最荒凉的沙漠:塔克拉玛干。这名字的意思是“进得去,出不来”。

火车旅程开始不久,沙漠便进入我们的眼帘。荒凉的沙丘无边无沿地从铁路两旁伸展开去。两个来小时以后,火车突然停了下来。四周什么也没有,没有城市,没有建筑,三三两两的人,屈指可数。警卫人员告诉我们说,要在这里等半个小时。于是我们便去找工程师聊天。刚聊一会儿,我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。

“下午好,” 她用英语对我们说。语音挺纯正,没有中国人常有的乡音。“你讲不讲英语?”

我迅速转过身来。只见一位身材高大、脸带笑容的美丽女子。她的衣着也很时髦。我告诉她说我能讲英语。

她看了看手表说:“好吧。火车会在这里停留23分钟。你知道不知道安东尼·特罗洛普(Anthony Trollope) 这位作家?”

真没想到会在中国的沙漠地带遇上提出这种问题的女子!不过她讲话的声音倒还使人高兴。我确实也知道特罗洛普。他写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和政治的小说一度曾经是我的所爱。

于是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

“太好了,”她说,一边看了看手上的表,“这样的话,我们可以有22分钟。我们来讨论他的作品吧,好吗?”

尽管我相当吃惊,但是她身上似乎有点儿什么逼着我照她所说的话做。接着我挖空心思,寻找记忆中特罗洛普的作品,尽我所知讲给她听。她一边听,一边笑。突然,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。“快,”她说,随手把我推上了车。“火车要开了。你得马上上车。”

但是,我像是刚从遐想中回到现实似的,对她说了声“不”。“你是谁?”我问她。接着又说了些傻乎乎的东西。“你真了不起。我一定得再次见到你。别走。请你告诉我你是谁。”

“别傻,” 她说,“我什么也不是。”这时火车已经启动。我把一张自己的名片从车窗里丢出去。只见她忙不迭地从沙地里把它捡了起来。火车来到了一个拐弯处。我再也看不到她的人影。沙漠从这里正式开始。她像是根本不存在似的。她是一个幽灵。

我把这故事讲给乔治听。“中国人真了不起,”他说道。那天我一直想着这女子,晚上在梦里也见到了她。但是我们已经来到卡萨克斯坦,后来在西伯利亚整整呆了两个月。那女子给我留下的只是惊讶。

直到我回到香港的住所,收到她的一封来信。信的开头这样写道:

“亲爱的温彻斯特先生,我的名字叫邢永珍(译者按:根据英文名字Xing Yong Zhen翻译)。今年34岁。我就是你在Kuytun遇到的那个女子。你也许还记得我吧?”

我怎么会忘记呢?

“我过去是一名教师,后来同共产党的一名官员结了婚。我们有一个儿子。两年前我们被送到这块沙漠地来,在一个小镇居住。这地方十分可怕:又脏又乱。最糟糕的是,谁也不讲英语。英语是我的最爱。我只觉得自己像是要死去似的。

“一年前,铁路通到这里。虽然车站离我们家好几里路,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我都会骑着自行车,穿过沙漠,等候火车的到来。我敲打每扇车窗,问里面的人:‘你讲英语吗?’有时有的人会说一声‘哈罗’或简单的几个字。

“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高个子。我问他说不说英语。你回答说‘说’。‘你知不知道特罗洛普?’你说知道。这样,将近半个小时——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高兴。我像是长了翅膀,要飞到天空中去似的。”

接着她问:“我们可以通信吗?”

就这样,我们成了朋友。但因为距离遥远,我们只能做柏拉图式的通信。我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,叫劳拉(Laura)。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,那是她到西安来看我。

五年以后,我写给她的一封信被退了回来:地址不详。我设法打电话,但是得到的电话录音十分简短:你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。她又变成了一个幽灵。

直到今天,当我提笔写下记忆中的劳拉时,我才认识到,除了感情的因素之外,她对我来说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因为她代表着中国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。劳拉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:她的国家已经不再闭关自守,盲目排外;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,为自己的优势——也因为与世隔绝——而妄自尊大(arrogant in its superiority and separatedness)。劳拉和其他数百万中国普通人一样,希望了解我们。他们是新的一代。

这些年来,我还和别的一些中国人交了朋友。我只能把他们称作“新的中国人”。其中一位名叫Gordon Cui。他是来自上海的一位聪明能干的工程师。20年前我帮助他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。最近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,在他把中餐送到我住宿的地方时重逢。我感到非常吃惊。但是他却平静地告诉我说,他已经读完了博士学位,也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白天的工作。但是他现在要赚尽可能多的美元,以便回到中国去。“我已经改变自己的梦想,”他说,“我觉得现在火炬已经传到中国。我要回到中国去,这样我可以成为新的未来的一部分。”

还有Freda Yu。1995年我在游览长江时她是我们的翻译。她现在在北京做营销,工作做得相当出色。不久前她对我说:“我们中国人眼睛总是向外。这样做带来的差别是惊人的。”她希望西方人能够来学中国的习惯和语言,也来钦佩她的人民。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,她的愿望正在开始实现。

至于劳拉,她愉快吗?自由吗?我并不知道。但是,我从自己所了解的她的个性来看,她一定没有问题。就像她的国家、她的人民一样。是的,我让自己放心:她经历过艰难的时期,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,我感到最终她一定会挺好的。

([美]西蒙·温彻斯特著 来源:博览群书)

我被于丹“挤”出《百家讲坛》

傅佩荣

学者傅佩荣被称为台湾版的于丹,他以《哲学与人生》开始为大陆读者所熟知。他在凤凰卫视主讲的《国学天空》,短短8分钟时间,将老庄孔孟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拉得更近。近日,傅的新书《人生困惑问庄子》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,再次引起读者的关注。该书出版后,本报记者连线采访了身在台湾的傅佩荣教授。

“与人交往要找到一个稳定模式”
庄子遵从顺其自然

广州日报:新书的意思是人生困惑的时候问庄子,您觉得庄子对读书持一种什么态度?

傅佩荣: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。因为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提到庄子,说他“其学无所不窥”,换句话说,庄子是任何书都看的,不过还好,古代的书很少。我们说一个人“学富五车”,也不过五本书(即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礼经》《乐经》《易经》),那时每一页都是竹简,五本书就五辆车。庄子是战国时代,书肯定已经很多了,但再怎么样的话,他求学就有一定的方法和目的,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学一点东西。

广州日报:您个人非常喜欢庄子,他最打动您的是哪一点?

傅佩荣:他的“不得已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这种“不得已”,不是被迫的、无奈的、不得不怎么样的,而是指当你条件成熟时顺其自然。人活在世界上,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发现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。条件成熟你做,可“顺水推舟”,“水到渠成”。反之则事倍功半,功败垂成。

把老庄孔孟思想应用于现代生活

广州日报:在现实生活中,最难处理的是人际关系,我们如何利用老庄的思想来维持和谐?

傅佩荣:把老庄孔孟思想应用于现代生活中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:一是内心的感受要真诚;二是对方的期许要沟通;三是社会规范要遵守。我母亲50多岁时因患脊椎肿瘤而瘫痪,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就跟母亲交流,问她怎样能使她快乐,母亲既不要钱,也不要我出名,只希望我陪她打麻将。于是我每个周末都陪母亲打麻将。但是没想到母亲的愿望满足后,又提出了新的要求,要我天天陪她打麻将,我说,母亲,你的快乐我不能一个人独占。我除了儿子身份还有其他角色需要负责,所以每周只能陪打一次。六个兄弟姐妹,每人陪妈妈一天,老人更有新鲜感。我由此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:与人交往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,长期维持和谐关系。

广州日报:庄子认为,人有十二种情绪,每种都可能会导致一些情况的出现,我们该如何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?

傅佩荣:庄子与惠施有一段辩论。惠施是一个说话高手,有一次庄子说,人应该无情。惠施说,人怎么可能没有人的情感呢?庄子就对惠施说,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,没有任何情感,而是说,你可以有情感,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内伤其身。这一点倒很符合儒家的想法。也就是说,喜怒哀乐要发而皆中节。所以孔子提到《诗经·关雎》时说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讲得真好。快乐但不要过度,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。不要说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。在《庄子》里面说,人的无情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,而是恰到好处。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,这样一来,我跟别人来往,喜怒哀乐的场合都不会影响到我内在的生命。

“《庄子》能治抑郁症”
台湾国学传播者红遍大陆

傅佩荣教授是台湾著名的国学传播者。他在台湾大学开设“哲学与人生”课程17年来,座无虚席,被大学生社团推选为最佳通识课,并被台湾《民生报》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。近年来,傅佩荣奔走两岸,为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群体宣讲传统文化精髓,用力甚勤,被称为两岸文化传播的“行者”。近年来在大陆已出版有:《哲学与人生》《智者的生活哲学》《智慧与人生》《走向成功人生》《孔子的生活智慧》《心灵导师》《解读论语》《解读易经》《解读庄子》《解读老子》《解读孟子》等。

一般哲学教授的学问都从书斋而出,但傅佩荣说,他的学问却是与最年轻的学生互动而来,是典型的教学相长。常常是,讲完孔子,学生说:还要听孟子。他说好,半年之后。果真只有半年的准备,他就开始讲孟子。接着再讲庄子、老子。渐渐的,他的哲学讲义变成了书,讲座变成了光碟。傅佩荣热,也从校园向社会发散,近两年又热到了大陆。

现代人读古代经典只在文字上打转

从事儒家、道家思想研究这些年来,傅佩荣觉得世人对两千多年前的哲学解读有很多的误区,他说:“单单《论语》,被当下忽略的、不求甚解的、比较普遍的误会,大约就有十几处,尤其是自宋朝朱熹注解之后,有很多明显的错误,我都在书中挑出来加以说明。很多人把孔子当做一个‘教主’,觉得他说的一定对,但又不求甚解。”

傅说,现在许多人读古代经典,还在文字上打转。很多人记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,仅仅因为接受它是一种权威,但对古人何出此言,则不清楚。这么读传统经典,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,还容易造成误读。

傅举例说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,“寡”“贫”二字互调,更符合逻辑;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”,其中“束脩”二字,原意为“干肉”,但他认为“行束脩”不是指给孔子献干肉,而是借“行束脩”这一古代男子十五岁时入大学所行的礼,代指“十五岁以上的人”,因为孔子在乎的是如何有效教导别人,而不是收学费。关于“行束脩”,大约有四百来个注解,他都看过。

30岁前学孔孟,40岁后学老庄

傅佩荣谈得最多的是国学的价值,“30岁以前一定要学孔孟,40岁之后就得学老庄”。现代人特别需要老庄。因为很多人感觉到社会成就都有了,但忽然觉得生命毫无意义,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,为什么这样活着。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,很容易让人患忧郁症。

老庄讲“道”,是在提醒世人,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?丢到海里。“道”就是海,“我”就是一滴水。只要滴水入海,水滴就可平安、愉悦。他说:“读了庄子的人不会得忧郁症。庄子讲无心而为,就是说‘好好做你的事,不要存特定的目的’。存有目的,不达目的就不安乐,忧郁症就是这样来的。”

“受苦受难不可怕,最怕的是受苦受难时你心里没有希望。你看过但丁的《神曲》就知道,地狱门口挂了块牌子,说‘凡到此者,必将希望放下’。学了儒家、道家,心里不空虚,生活就不会像地狱一样。”

“于丹讲《论语》是随机的我是整体系统的”
不学《易经》就只活在当下

广州日报:最近几年大学的国学很热,很多地方开办国学讲堂,您觉得我们该如何来学习国学的经典?

傅佩荣:在我个人看来,年轻时适合读“儒家”。念书、考试……当然得入世。你不入世,跟人群不建立关系,说不过去。儒家便于梳理人之间的关系,道家便于梳理人和“道家”之间的关系。人到三四十岁时,便会对道家有体会。人到中年,事业上有成败得失,跟人相处也有愉快也有不愉快,庄子劝人看开。

“天道好还”,这就是老子的思想,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,很多事情,你不要以为逃得过。你只要有这些事情,将来总会受它的影响。你怎么加以解决,这是道家的智慧。学不学《易经》,完全是两种生命形态。不学《易经》,你就在它所建构的世界门外。你没入门,就活在当下。每天发生的事情,来来去去,各种新闻,眼花缭乱。

广州日报:为人父母难,想让孩子快乐,怎么样让他快乐,该怎么做?有没有什么好办法,能让孩子快乐?

傅佩荣:教育孩子,基本上要顺从他的本性,尽量不要违背。你违背了的话,对于他来说,是一种伤害。即使成功的话,他恐怕得不偿失;对于教育他的人来说,恐怕是事倍功半,你辛辛苦苦弄了半天,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。

这方面,庄子又给我们讲了什么故事呢?他提到一个我们熟悉的所谓的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”的故事。他说,你看这伯乐很厉害吧?他一看就知道,哪一匹马比较有希望变成千里马。他开始训练它,但这是违背马的本性。庄子说,马平常就是吃草、喝水,高兴的时候,交颈相摩;生气的时候,怒目相踢,这很生动。

要上百家讲坛说《孟子》

广州日报:您上凤凰卫视讲《论语》,还在上海讲传统文化,有打算上《百家讲坛》讲您对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解吗?

傅佩荣:我在凤凰卫视讲《国学天空》和于丹风格不同,当然央视的《百家讲坛》我还是准备去讲,已经达成意向,主要是讲《孟子》前期,已经录制了一些。

其实,我曾受邀到央视《百家讲坛》试讲了两集《易经》,后来开讲《论语》,原计划请于丹讲7集,我讲30集,每一集的题目都已定好,结果于丹的一播出轰动全国,人家说,你就不用讲了。

于丹是比较随机的,几句话有所感动,就用生动的故事、比喻来加以阐述,随机地选择几段,一般人看起来喜欢,觉得有意思;我不是随机选择,而是做整体研究,等研究有了完整的、系统的理解,再设法把它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。这个对比一下就知道。

(吴波 来源:广州日报)

母亲的戒指

小时候家里穷,所以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没有可炫耀的东西,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远远地观望。

一次我去一个小朋友家玩儿,他妈妈正在摆弄一个金戒指。于是他问我:“没见过戒指吧?”我忽然想起母亲也曾戴过这东西,于是说:“怎么没见过?我妈有好几个呢!有黄的有白的,平时都不戴!”他不信,我便把他领回家。我问母亲:“妈,把你的那些戒指拿出来给他看看!”母亲一愣,说:“我哪有什么戒指啊?”我说:“就是你做针线活时戴在手上的那个!”

母亲笑了,从针线盒里拿出了她的那几个戒指,小朋友一看哈哈大笑起来,说:“这不是顶针吗?”我不禁大为失望,对母亲说:“真穷,连戒指都没有!”母亲只是微笑地看着我。

在那以后的许多岁月中,母亲依然戴着她的顶针给我们做衣服纳鞋底,我渐渐地感到了母亲的艰辛,于是很为自己说她的话而愧疚。而母亲仿佛早已忘了那件事,一如既往地给我们不变的爱和关怀。

参加工作后一直想给母亲买个戒指,这已成为我心中多年的一个愿望,可是母亲不要,说她的手只适合戴顶针,那才是她最喜欢的“戒指”啊!我曾仔细地看过母亲保存的那些顶针,时光流逝,有的顶针上面的小眼已经磨平。想着母亲在那么多夜里缝缝补补的情景,心总会于感动中慢慢濡湿。母亲就是这样把她的爱一针一针缝补进成长的岁月,缝补进我们日渐沧桑的心中。

现在母亲有时依然会做些针线活,那样的时刻,她手指上的顶针便会刺痛我的双眼,让我的心涌起无尽的爱与感动!

(刘影子 来源:三峡晚报)